

刘勰论写作之道

钟子翱 黄安祯

文心雕龙讲座专辑

刘勰论 写作之道

钟子翱 黄安禎 著

解放军报编辑部编
长征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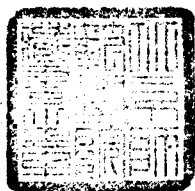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7058

977058



刘勰论写作之道

钟子翱 黄安祯著

*

长征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阜外大街34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二二三〇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360千字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40,000

统一书号：9268·004

定价：2.00元

出版前言

我国齐梁时代的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写的《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而又精深的古典文学理论名著，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刘勰文学理论的精华，主要就集中在他的创作论——写作之道部分。在这里，刘勰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我国历代作家和诗人们的写作理论、写作经验和写作方法，无论在构思的意匠经营上，文思的开塞上，作家和作品的风格上，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的通变上，情采的内容和形式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文章的修改润饰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可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文心雕龙》一书不免带有一些封建主义的杂质和唯心主义的糟粕。加上刘勰写这本书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骈俪文体，兼以徵引浩博，用语艰深。这就使我们在阅读《文心雕龙》并正确理解它的内容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为了帮助大家克服这些困难，使大家能正确地批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借以提高写作水平，我们特从一九八〇年七月起，在《解放军报通讯》上开辟了“《文心雕龙》讲座”专栏，约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钟子翱、黄安顽撰写讲义，连续发表了二十四讲。

《讲座》发表之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重视，四面八方纷纷来信，或提出疑难问题，或接洽购买《讲座》材料，或要求讲解《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更多的是要求把讲义汇编成册。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把讲义汇集成书，取名为《刘勰论写作之道》，交长征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本书出版前，钟子翱、黄安颖同志又集中时间对原讲义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增补：

一、增写了一篇《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放在书首，目的是使读者对《文心雕龙》从总体上有个概貌的了解，从而为具体学习其创作论——写作之道打下根底。

二、增写了一篇《刘勰的创作论》置于书尾，目的是使读者在分篇阅读全书之后，再综合起来研讨领会刘勰所阐述的写作之道。

三、在分篇讲解《文心雕龙》中与写作有关的二十七篇原文时，每篇都是先讲解，后附原文、白话译文和注释，以便大家对照阅读，易学好懂。

四、编排次序，基本上按照刘勰的原著的顺序作了调整。

与原《讲座》相比，本书进一步突出了以下特点：

一、集中。它是根据初学作者的特点和需要，专就《文心雕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创作论即写作之道，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二、通俗。它以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为主要对象，无论是讲解还是注释，都尽量注意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作者在这一点上花费了大量的劳动。

三、实在。在讲解中尽可能联系了当今写作中的实际问题，做到有的放矢。作者注意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刘勰的原著，对其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封建主义糟粕作了一定的批判，对其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作了比较全面的阐释和评介，并从美学理论的高度作了简明的分析和探讨。

因此，本书既不同于一般的《文心雕龙译注》或《文心雕龙注释》，也不同于专题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它是一本比较通俗的写作教材，对于初学写作者借鉴我国古人的写作经验，提高写作水平，会有较大的帮助。

作者再三表示：由于《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文字艰深，不少疑难问题，还有待学术界研究解决，加上个人学识水平有限，所以缺点和错误，可能还有不少，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和修改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同志的注本、译文和评论著作，并得到了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与指导，在这里，一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解放军报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一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钟子翱、黄安祯同志为《解放军报通讯》写的《文心雕龙讲座》通俗讲话材料。这次结集出版前，作者又作了较大的修改，每一讲都附上了原文、白话译文和注解。

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文心雕龙注释》或《文心雕龙译注》。它是根据初学作者的特点和需要，专就《文心雕龙》最有价值的部分——创作论即写作之道，作了集中的、系统的介绍，把《文心雕龙》中有关写作理论、写作经验和写作方法的篇章，逐一作了通俗的讲解，并从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简略的分析和探讨。在讲解中，作者注意联系当今写作实际，尽可能做到深入浅出，有的放矢。因此，本书是一本比较通俗的写作教材，它对于广大初学写作者借鉴我国古人的写作经验，提高写作水平，会有较大的帮助，对于古文论研究工作者、文学评论工作者、文艺创作人员和语文教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1)
附：《序志》和译注	(19)
道沿圣以垂文 圣因文而明道	
——谈《原道》	(31)
附：《原道》和译注	(40)
志足而言文 情信而辞巧	
——谈《征圣》	(51)
附：《征圣》和译注	(90)
文能宗经 体有六义	
——谈《宗经》	(69)
附：《宗经》和译注	(77)
酌奇而不失其贞 玩华而不坠其实	
——谈《辨骚》	(90)
附：《辨骚》和译注	(99)
感物吟志 莫非自然	
——谈《明诗》	(113)
附：《明诗》和译注	(123)
丽辞雅义 符采相胜	
——谈《诠赋》	(141)
附：《诠赋》和译注	(149)

心与理合 辞共心密	
——谈《论说》	(161)
附：《论说》和译注	(169)
寂然凝虑 神与物游	
——谈《神思》	(187)
附：《神思》和译注	(196)
各师成心 其异如面	
——谈《体性》	(207)
附：《体性》和译注	(217)
风清骨峻 篇体光华	
——谈《风骨》	(227)
附：《风骨》和译注	(236)
凭情以会通 负气以适变	
——谈《通变》	(245)
附：《通变》和译注	(254)
因情立体 即体成势	
——谈《定势》	(264)
附：《定势》和译注	(273)
为情而造文 要约而写真	
——谈《情采》	(283)
附：《情采》和译注	(292)
情周而不繁 辞运而不滥	
——谈《熔裁》	(302)
附：《熔裁》和译注	(311)
吹律胸臆 调钟唇吻	
——谈《声律》	(319)

附：《声律》和译注·····	(326)
外文绮交 内义脉注	
——谈《章句》·····	(336)
附：《章句》和译注·····	(342)
理园事密 联璧其章	
——谈《丽辞》·····	(352)
附：《丽辞》和译注·····	(359)
触物圆览 拟容取心	
——谈《比兴》·····	(368)
附：《比兴》和译注·····	(377)
夸而有节 饰而不诬	
——谈《夸饰》·····	(386)
附：《夸饰》和译注·····	(393)
取事贵约 表里发挥	
——谈《事类》·····	(402)
附：《事类》和译注·····	(409)
声画昭精 墨采腾奋	
——谈《练字》·····	(421)
附：《练字》和译注·····	(427)
情在辞外 状溢目前	
——谈《隐秀》·····	(438)
附：《隐秀》和译注·····	(444)
驱万涂于同归 贞百虑于一致	
——谈《附会》·····	(448)
附：《附会》和译注·····	(456)
乘一总万 举要治繁	

——谈《总术》	(466)
附：《总术》和译注	(474)
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	
——谈《物色》	(484)
附：《物色》和译注	(492)
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	
——谈《时序》	(501)
附：《时序》和译注	(510)
刘勰的创作论	(534)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刘勰是齐梁时代一位卓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系完整、组织严密、内容丰富、颇多创见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这部名作，在问世以来的一千四百多年里，一直为人们所推崇和赞许：沈约赞扬它“深得文理”（《梁书·刘勰传》）；胡应麟称许它“议论精凿”（《诗薮·内编》）；章学诚褒奖它“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诗话》）……。它对当时和后代的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文学理论宝库中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今天看来，虽然其中含有不少封建性的糟粕和过了时的东西，必须抛弃，但却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观点、精辟的理论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对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必须加以批判继承。总地看来，它是白璧微瑕，瑕不掩瑜的。

刘勰，字彦和，原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永嘉乱后，世代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他的生卒年代，由于史料不足，难以确考，因此说法纷纭。范文澜同志推断：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前后，卒于梁武帝普通元、二年（公元520—521年）间；杨明照先生考订：约

生于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卒于梁武帝大同四、五年（公元538年—539年）。最近李庆甲同志根据《续藏经》材料的发现，证明刘勰出家在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据《梁书·刘勰传》“未期而卒”的记载推算，刘勰的卒年应该是中大通四年，即公元532年。这比范文澜同志的推算要晚十一年。但周振甫先生认为还是范文澜同志的推算比较可靠。

刘家原是京口的大族，但到刘勰时已没落了。他早年丧父，二十岁左右母亲去世，“家贫不能婚娶”（《梁书·刘勰传》），便投奔当时著名的佛教大师僧祐门下，寄居在南京附近的定林寺中，帮助僧祐整理佛经。在定林寺的十多年生活里，他不仅精通了佛学，而且博览群书，对儒家典籍和历代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钻研。这为他写作《文心雕龙》，做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心雕龙》约写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成于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前后，此时刘勰年约三十三、四岁。书成后，他曾送请当时身居高位的文坛领袖沈约鉴定；沈约大为赏识，“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梁书·刘勰传》）。大概从此他才有点名望。不久，梁朝建立，可能是由于沈约的推荐，他才得任官职。起初，只做了个“奉朝请”虚衔小官；后来担任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秘书性职务）、车骑仓曹参军（掌管王府车骑仓库），又出任太末（今浙江龙游县）令，因有政绩，升任仁威将军南康（江西南康县）王萧绩的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太子宫中执掌呈进文书的官，近于侍从）。因而得与爱好文学的昭明太子萧统亲密交结。后升任步兵校尉（管领京都禁卫的武官），并仍兼东宫通事舍

人。萧统死后，刘勰脱离政界，又回定林寺与慧震和尚一起修订经藏，终于在定林寺出家，不到一年便去世了。

刘勰经历宋、齐、梁三朝，主要活动于齐、梁时代。这时，政权全被士族大地主所把持，门阀制度等级森严。统治阶层苟且偷安，利用种种特权，肆意剥削，尽情享受，一方面钩心斗角，争权夺利，一方面却又大建寺庙，念经拜佛。因此，社会矛盾重重，政治局势混乱。在社会思想领域，佛教盛行，崇尚虚谈，不务实际，各种思想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儒学在表面上虽然居重要地位，有些统治者甚至加以提倡；但实际上已趋衰微，失去了思想的约束作用。与此相适应，在文学领域，强调讽谏的风雅传统和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几乎丧失殆尽，普遍流行一种内容空虚、形式华丽、雕章琢句、奇诡轻靡的形式主义文风。但由于江南物产丰饶，没有大的战祸，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等却都有些发展；同时由于魏、晋以来文学昌盛，文学特点的明确，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远非以往所能比拟。刘勰就是生活活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他的思想观点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早年，他虽曾怀有建立一番功业的抱负；但却没有飞黄腾达所必不可缺的门阀的阶梯，摆在他面前的，只有所谓“立言”一条道路，即凭借著书立说以留名后世。这是儒家传统的思想，也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之一。

总的看来，刘勰的一生，在政治上并不很得志，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然而在学术上却有着巨大的贡献。这除整理修订佛经外，就是写下了《文心雕龙》这部不朽的名著。

刘勰为什么要写《文心雕龙》呢？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他明确说过：“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

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由此可见，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就是要阐扬儒家的文学社会作用的理论观点，用以纠正齐梁时代浮靡奇诡的形式主义文风。

不满意魏晋以来论述文章的著作，也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原因之一。在《序志》中，他接着上文写道：“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一作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这清楚地说明了对以往的论文著作，刘勰是都不满意的。不言而喻，他是要写一部体现儒家观点，溯源流、论文体、阐明写作原理、精当而完备的文学理论著作，也就是要以《文心雕龙》取而代之。这里表现出了青年文学

理论家刘勰的壮志和雄心。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刘勰把它分为上下两编、五个部分。上编二十五篇，是论文章的“纲领”的；下编是论文章的“毛目”的，加上总序《序志》，也是二十五篇。他这个篇数的确定，是根据《易·系辞上》说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以他在《序志》里提到：“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没谈“文用”的一篇，就是末篇《序志》。书的五个部分是：一，“文之枢纽”；二，“论文叙笔”；三，“剖情析采”；四，文学发展论、批评论、作家论；五，“长怀序志”。他对一些理论的阐述和作家作品的评价都是采取“唯务折衷”的办法。

第一部分“文之枢纽”，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在这里，刘勰阐明了他基本的文学观点和文学主张，那就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这根本性的观点和主张，贯串于《文心雕龙》的各个部分，是刘勰论述一切文学问题的根本的理论依据，所以这一部分，可称为全书的总论或总纲。

在“文之枢纽”中，《原道》、《征圣》和《宗经》居于核心地位。就刘勰的文学思想体系来看，“原道”、“征圣”、“宗经”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他之所以要“正纬”、“辨骚”，根本的目的，也是为了确立和维护“原道”、“征圣”、“宗经”这个文学思想体系，以便用以纠正齐梁时代的形式主义文风，把文学的发展引入正确的轨道。

刘勰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万物都是“道”的自然体现，文章也是根源于“道”的。所以他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原道》）。“太极”就是刘勰所说的“道”，有时也称为“神理”。他同时认为：“道”、“圣”、“文”三者的关系，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同上）。也就是：“道”是依靠圣人用文章来显示的，圣人是凭借文章来阐明“道”的。因为“道”是极其幽微神妙的，只有智慧最高的圣人，才能体会、认识并用文章加以阐明。由于文章根源于“道”，所以为文和论文必须“原道”，即“本乎道”；由于“道沿圣以垂文”，所以为文和论文必须“征圣”，即“师乎圣”；由于“圣因文而明道”，而且圣人已早离人世，留下的只有一些“明道”的经书了，所以为文和论文必须“宗经”，即“体乎经”。这就是刘勰最根本的文学思想体系，也就是“文之枢纽”的最根本的思想逻辑。十分明显，“原道”、“征圣”、“宗经”是刘勰最根本的文学观点，而“明道”则是他最根本的文学主张。

为什么刘勰不把《正纬》、《辨骚》放入文体论中，而把它们列入“文之枢纽”呢？换句话说，刘勰为什么把“纬”、“骚”也看得如此重要，而与“原道”、“征圣”、“宗经”相提并论呢？总地来说，这是文学发展的现实使然，“纬”、“骚”的问题，与“原道”、“征圣”、“宗经”关系重大的缘故。

我们知道，战国后期，屈原的骚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光照文苑，汉代辞赋家群起仿效，文风日益侈艳；齐梁时代更变本加厉。同时，由于汉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迷信